

经济评论

简 报

2011 年第 1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1 年 2 月 15 日

编者按

1. 对金融危机中信用违约互换的重新认识 ----- 邓斌 张涤新
 2. 货币管理目标不能依据简单的理性人假设 ----- 郑浩
 3. 企业差异化战略对价格和质量竞争博弈均衡解的影响研究 ----- 龚日朝 刘玲
 4. 价值转形是伪命题吗？与冯金华教授商榷以及一点评论 ----- 裴宏
 5. 劳动价值论的构图——一种马克思主义整体解读观 ----- 许光伟
 6. 彼此隔绝的个体——现象学视野中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 ----- 刘牧
 7. 十大振兴规划产业发展对策的实证研究 ----- 罗来军 陈衍泰等
 8. 城市圈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分析 ----- 余静文 王春超
 9. 资本约束下的银行资本调整与风险行为 ----- 许友传
 10. 我国中期通货膨胀压力预测 ----- 李宏瑾
 11. 信贷偏好与中国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增长结构 ----- 汤向俊 任保平
 12. 中国流通业税收贡献的实证分析 ----- 王乔 席卫群等
 13.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中合谋防御的机制设计 ----- 蒋神州
 14. 破解我国贸易顺差成因问题的关键环节 ----- 王剑锋
 15. 货币政策是否应该直接干预房地产泡沫？ ----- 段忠东 朱孟楠
 16. 中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研究 ----- 赵学刚 王学斌 刘康兵
- 《经济评论》简介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向《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报刊以及网站经济频道等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将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经济理论探索

1.对金融危机中信用违约互换的重新认识

邓斌 张涤新（南京大学）

《金融危机背景下信用违约互换道德风险研究》，《经济评论》2011 年第 1 期

信用违约互换(CDS)是一种基于贷款或债券等金融资产的衍生产品。按照该产品的交易合约，买方定期支付一定费用给卖方，如果在合约规定的期限内，买方所持有的贷款或债券等参照资产发生违约或信用等级下降，导致买方遭受损失，那么卖方将对买方的这些损失予以补偿。从经济效果来看，CDS 与保险合约类似，只不过投保对象是贷款或债券等金融资产。CDS 作为创新型的金融衍生产品，在信用风险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短时间内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和追捧，然而次贷危机爆发后，CDS 市场又跌入低谷。

2007 年爆发于美国并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信用衍生品的负面影响显得十分突出。信用衍生品是否是危害金融稳定、导致金融危机的潘多拉魔盒？本文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金融创新产品纷繁复杂，各种产品在金融危机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将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笼统归结为信用衍生品是不确切的。实际上美国银行业向不合格贷款人发放大量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才是市场风险的根源；其次，CDS 市场在次贷危机中的实际表现证明其并非导致危机的元凶，CDS 价差在危机发生第一年(2007 年 4 月-2008 年 3 月)保持平稳，即使遭受雷曼兄弟破产事件影响，CDS 市场清算交易仍顺利进行。此后 CDS 价差上升和市场萎缩实际上反映了金融危机逐步深化及市场流动性日益枯竭的状况。这意味着金融危机是导致 CDS 市场萎缩的原因，而不是反过来，CDS 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

CDS 交易作为一种信用风险转移工具，对整个银行体系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CDS 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和分散，实现信用风险在银行体系内外的优化配置。由于不同金融主体承担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存在差异，CDS 可以根据这种差异将信用风险转移到最有能力承担该风险的金融主体，有利于维护银行体系稳定；另一方面，这种风险转移和分散机制也造成风险传染，使损失不再局限于银行，而是由信贷市场迅速地传导到资本市场，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对于单个银行主体同样如此：一方面，CDS 为银行提供了积极的信用风险管理方法。可以分散和转移风险，提高银行资本配置效率和收益；可以缓解“信用悖论”，扩大贷款供给规模；还有助于贷款市场价格发现，提高市场效率；另一方面，信用风险转移必然会弱化其审查监督信贷资产、控制风险的激励，在信用违约互换交易为银行信贷资产提供完全信用保护的情况下，银行监督努力水平可能为零。这意味着银行购买信用违约互换后信贷资产质量会下降、贷款违约的可能性增加。如果对这种道德风险不加以控制，该交易会

导致信用风险的聚集和增加。

信用违约互换合约给银行提供了完全的保险,无论贷款是否能够收回,银行都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最有承担贷款违约损失的不是其自身,而是信用违约互换的卖方。在此情况下,银行一定不会在贷后管理方面尽心尽责,甚至会偷懒。本文找到了 CDS 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即信用违约互换为银行提供了完全的保险,银行不承担任何风险。要控制这种道德风险,就必须对症下药。本文设计出一种风险共担的信用违约互换合约,通过向银行提供部分的保险,让银行承担部分风险,使其保持适度的监督激励,从而有效地降低道德风险。只要信用违约互换给银行提供部分保险,银行就不会尽最大努力去监督信贷资产,道德风险就无法消除。这是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不利方面。但交易双方承担风险的能力差异决定了信用违约互换在信用风险优化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银行购买信用违约互换是一种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行为。这是该交易的有利方面。总体而言,如果采取适当的风险共担合约来控制其道德风险,那么信用违约互换仍能够很好地发挥其积极的信用风险转移和优化配置作用。

2. 货币管理目标不能依据简单的理性人假设

郑浩 (武汉大学)

《货币模型中时间偏好与经济稳定性的分析》,《经济评论》2011 年第 1 期

内生时间偏好的研究从 60 年代至今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门问题,时间偏好在投资与储蓄、经济增长、消费习惯及资产定价理论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传统的经济理论假设“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具有完备记忆、稳定的偏好,因此在很多的文献中都把其作为一个固定值。但是这样的理性假设实际上超越了人的内在特性——人是有限能力、有限智慧、有限情绪的。

根据传统经济学家的思想,我们能观察到时间偏好的三个方面:第一,人们并不是有相同程度的耐心。第二,人们之间关于时间偏好的不同是可以解释的,比如,时间偏好可能与经济发展程度、收入以及教育水平有关。第三,人们的时间偏好有时是非理性的。大量实证结果表明时间偏好和个人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统计数据也表明富人更有耐心。

本文在时间偏好异质性假设下建立了一个货币管理机构采取利率反馈规则的货币模型,并假定个体的时间偏好依赖于整个经济的收入、平均消费和货币量,运用动态法研究了具有社会属性的时间偏好是如何影响经济长期均衡处的稳定性的。结论是异质的时间偏好对于货币政策的实现效果起着重要作用,不同的货币政策会对市场能否恢复到均衡状态产生影响。只有当个体的效用函数满足本文给出的充分条件时,调节利率的经济政策才不会对均衡处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否则政策会失效甚至起到副作用。

人作为一个“经济人”往往只能呈现出一种有界的理性。他们可能会缺乏自我控制和耐心,尤其体现在短期的非耐心上,这种短期的非耐心造成消费者对效用流的相对评价会随着

时间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偏好系统的不稳定——消费者在开始时所计划的消费流,在未来被执行时可能存在着偏离。因此,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目标不能依据简单的理性人假设作为稳定标准,而应当结合具体的经济背景,对影响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个体偏好进行充分考虑,这种考虑如若不当将使得货币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与实体经济的增长背道而驰。

这说明在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时,弄清楚消费者的效用评价变化是有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可能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相悖,进而会在相当程度上抑制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中央银行通过对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的调整和控制,引导市场对利率变动预期的同时,也应及时考虑个体对自身效用评价的变化。建议中央银行建立一套监测个体情绪变化的指标,作为经济政策实施时考虑的因素,在政策执行时对影响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个体偏好进行审慎评估,以充分考虑能否达到国家中长期稳定性均衡的目标。

3.企业差异化战略对价格和质量竞争博弈均衡解的影响研究

龚日朝 刘玲(湖南科技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

在消费者购买商品不仅考虑商品价格而且考虑商品质量水平的需求市场,如果存在两个寡头企业提供某类同质的产品,则市场必然导致两寡头企业之间产生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水平的两因素竞争博弈。因此,企业采取差异化经营战略是企业占有市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然而,不同地域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消费水平存在差异,不同地域市场对商品价格和质量水平的敏感度往往有所偏重,有的市场对商品价格敏感,消费者更多地关注商品的价格;而有的市场则对商品的质量敏感,消费者更多地关注商品的品质。为此,企业必须准确地判断市场对产品价格和质量水平的敏感度,确定市场特征,并根据市场特征确定与对手企业的差异化程度科学制定企业差异化战略,确保市场竞争处于均衡状态。

本文通过消费者根据企业产品质量水平对企业给出的产品价格和质量的“折扣”系数,构建市场对产品价格和质量水平的敏感度测度工具,并通过消费者对两企业的产品需求函数,定量地刻画企业的差异化策略及其差异化程度,构建产品价格和质量水平的竞争博弈模型,研究博弈均衡解的存在条件以及不同的需求市场差异化策略对博弈均衡解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价格敏感市场还是质量敏感市场,企业差异化程度对博弈均衡解存在影响。只有在两企业具有一定的差异化程度前提下,两企业之间的博弈才存在均衡,否则,市场均衡状态不存在,会导致出现恶性竞争。在市场竞争博弈均衡解存在的条件下,如果市场是价格敏感市场,则两企业差异化程度越大,企业不仅获得的均衡利润与产品的可接受价格都将越高,而且需求量越大。否则,如果市场是质量敏感市场,则两企业差异化程度越大,获得的均衡利润越高。但是,在质量低敏感市场、中度敏感市场和高度敏感市场,均衡可接受价格分别是企业差异化程度的严格单调递增函数、先单调递增然后单调递减的凹函数、严格单调递减函数。

因此,在多寡头市场,企业要提高市场竞争力,必须开展市场调查,准确了解市场消费者群体对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水平的认可程度,确定市场特征。同时,必须极大可能地掌握对手企业的经营战略,尽可能地构建具有差异化的战略,形成鲜明的企业特色。只有企业之间的战略具有最大的差异化,才能确保市场竞争博弈的均衡存在,而且企业才能获得更高的均衡利润。

4.价值转形是伪命题吗?——与冯金华教授商榷以及一点评论

裴宏(厦门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

价值转形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著名问题,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当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众所周知,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自有框架和研究方法而言,价值转形理论起到由“抽象”到“具体”的过渡作用。在适当的意义上,可以把价值转形问题理解为是保证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论”相结合的抽象命题和范畴,逻辑一致地转化为资本主义具体规律的前置的核心理论。

冯金华教授从2008年开始对价值转形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深刻而富有创意的研究。他的研究建立在“偏离系数法”这一基本方法上,根据“两部类补偿”这一约束条件,通过一系列的证明得出:“生产价格总是等于价值的”,从而宣布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转形”是一个多余的命题。

但是,在该问题的研究上,冯金华教授的错误在于没有区分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的各自独立的运动规定性以及各自不同的理论内涵。从而事实上,冯金华教授的模型并未真正区分马克思的生产价格体系和价值体系。具体地说,在一些模型下,他错误地将生产价格体系必须满足的“周转平衡”及“资本补偿”的规定性附加于价值体系;在另一些模型下,则用价值体系的分解顶替了生产价格的这些规定性。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一系列分析。因此,在他的模型框架下,得到“转形问题是一个伪命题”的错误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分析取向的角度上说,价值转形问题应当更关注如何构建“价值——生产价格”的联系,而不是单纯地去证明价值转形是可解的。事实上,马克思实质关心的,正是这种转形是否对他的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马克思运用他独特的分析方式判定,价值转形问题本质上并不影响他的资本主义解读。

从分析思路上看,冯金华教授大胆而创新的分析方法,也许可以看作是“偏离系数”方法和“对偶体系”的某种综合。而且他的基本立场是“对偶体系”的,是在承认“对偶体系”的存在性条件下讨论“偏离系数”问题。尽管冯金华教授的研究过程和所得结论是有误的,但他的研究出发点和所用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国内的学界仍然是新颖的。而正是因为这一解决思路意味着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细致而多样的解读,无论在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不同学者将有如何巨大的差异,冯金华教授的关于价值转形的系列论文都将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5. 劳动价值论的构图——一种马克思主义整体解读观

许光伟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评论》2011 年第 1 期

当下劳动价值论所遭遇的危机, 需要实践性的根本解决。整体解读劳动价值论, 其在方法论与理论的结合层面形成系统的扩展张力, 展开为劳动-价值-价格的研究主线和逻辑发展图景。形成三个层面的结构性认识:

(1) 劳动是历史二重的规定。劳动概念由马克思的《资本论》奠基。从文本解读看,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整体镶嵌在劳动过程和劳动二重性语境结构中。劳动过程和二重性均是历史的规定。这就是说, 劳动的抽象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进行的, 在特定阶段上, 劳动范畴才是相对既定对象而言的抽象。在构图上, 劳动是“时间的过程”(时间生成) 和“结构的过程”(结构生成) 的双重存在。前者是发生学本体, 后者是实践本体。这说明劳动是关于动态历史过程的规定。从真正意义的动态过程出发, 导致必然将劳动视为对象化实践活动、目的论设定过程以及关于知识的创造性活动。换言之, 劳动之于对象的物化, 恰恰是目的论设定过程, 即知识创造活动的对象化。从而, 为了实现总体分析, 劳动价值论必须同时是关于具体和抽象乃至同质结构和异质结构的理论统一。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 劳动是历史二重的规定, 构图为本体论上的存在和机制, 从中细化出同质劳动、异质劳动范畴。

(2) 价值是社会总体的规定。劳动转化为价值, 并不意味着自身的消失, 而是成为更为“具体”和更不“抽象”的社会结构, 即劳动-价值。不过与劳动作为本体的存在和机制不同, 价值是关于社会实体的存在和机制。作为有机结构分析的实施, 在构图上, 价值转化为关于“整体的结构”(价值本质) 和“系统的结构”(价值运行) 的双重存在。前者对应为发生学结构, 后者进一步对应为实践结构。这意味着, 整体是价值的社会存在结构, 是理论化的形成过程和出发点。因此, 同质劳动必须进一步转化成同质商品, 对应一个发达的商品世界。同质商品范畴是关于商品总体的构图, 是关于商品生活世界的总的图像及其构成的规定。和同质商品范畴相对, 异质商品范畴是关于商品局部的构图, 是构成的图像和过程的规定。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 价值是社会总体的规定, 构图为关于社会实体的存在和机制, 从中细化出同质商品、异质商品范畴。

(3) 价格是政治实践的规定。在构图上, 价格以“整体的现象”(社会历史过程) 和“运动的现象”(生产政治过程) 的双重存在得以实现。前者是发生学现象, 后者是实践现象。这说明在实践性上, 价格是关于现象运动的存在和机制。这就需要建立社会价格对于“内部价格”的现实归依。由此得出第三个结论: 价格是政治实践的规定, 构图为关于现象运动的存在和机制, 从中细化出社会价格、内部价格范畴。

这些不同层级的存在及其运动机制, 形成为系统总体的差别的统一, 完成了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构图。研究进一步表明: 劳动价值论不只是一种理论关系, 更为主要地是一种实践关系, 是在寻求逻辑(方法) 和认识(理论) 的统一中实现的对事实的全部理解。

6.彼此隔绝的个体——现象学视野中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

刘牧 (北京化工大学),《经济评论》2011 年第 1 期

个体主义方法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具体的经济行为主体,一切复杂的经济现象最终都应该还原为个体的经济行为,个体先于社会独立存在。近年来,个体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从纯粹的经济学领域扩展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象。尽管现代认知科学的最新进展已经揭示出主流经济学所遵循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存在着严重缺陷,主流经济学家仍不愿放弃它。这促使我们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心理基础进行思考,揭示个体主义方法论赖以生存的思想土壤。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把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涉及到个体之间的经济交往,为了实现这种交往个体必须首先对他人有所理解,即他人不是无生命的纯粹客体,而本身就是一个拥有思维和情感的主体。他人的自我如何被把握的问题对经济学来说是个根本问题。近代主流思想认为每个人都能毫无障碍地感知到自己的情感与思维过程,而他人的自我及心灵生活则不能被直接感知到,因此他人的自我只能通过猜测的方式被我们把握到。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正是这种观点的产物。由于对每个人来说最先能把握到的是他自己的自我,对它的认识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在分析人类经济行为的时候,最恰当的出发点就是个人。他人的存在是被我们猜测到的,与他人的经济交往本质上是偶然的,经济交往本身不是人们的目的,它只能被理解为增进个体福利的手段,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从根本上不过是一场伟大的意外。但是对他人自我的上述观点从逻辑上就是不能成立的。通过猜测只能推出“我的自我”不是唯一的,而不能推出存在着“你的自我”或“他的自我”。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最先呈现给个体的往往不是他自己的自我,而是他人的自我,人最先生活于他人之中。拥有独立自我意识的个体出现得很晚,本身就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把它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可能会颠倒因果关系。同时现象学分析也表明他人的心灵生活也可以被直观到,而不仅仅是被猜测到。由此可见,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根基并不稳固,并不存在先于社会的孤立个体,将其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是不适当的。经济学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突破个体主义方法论的限制,在方法论领域实现变革。

中国经济研究

7. 十大振兴规划产业发展对策的实证研究

罗来军（中国人民大学）、陈衍泰（清华大学）、刘畅（宁波诺丁汉大学）、

罗雨泽（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经济评论》2011 年第 1 期

为了防止中国经济因金融危机而加速下滑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我国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轻工、石化、有色金属产业和物流业等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这些规划涉及范围之广、政策力度之大、决策效率之高，前所未有。十大产业的运行状况，直接关系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本文从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构建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对十大振兴规划产业中的九大产业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重要产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重要策略：（1）我国出口的绝对数量对产业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而出口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却起负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显示目前正作用仍大于负作用。为此，出口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上，才能保证对产业发展的整体作用是最大的。稳定出口的数量，适度控制出口占总产值的比重，是外贸的最优选择。（2）在人力资本、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方面，人力资本的作用在装备制造业、纺织产业和船舶产业中较显著，而其余产业的情况均不好；汽车产业、钢铁产业、装备制造业、船舶产业和有色金属产业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对产业发展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而纺织产业、轻工业、石化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我国很多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和国外发达国家的同类产业和企业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要想缩小乃至最终赶超，自主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是重要的驱动因素。（3）在振兴规划产业中，钢铁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石化产业对国外研发溢出的吸收是较好的，国外的技术引进对产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六个产业则较差。引进、消化和利用国外技术，是我国促进技术进步的一项重要措施。（4）就业出现转向信号，石化产业和有色金属业的就业边际增加对它们的发展起了负面影响。在某些产业的现有就业容纳能力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增加这些产业的就业，会伤害发展和效率。（5）投资出现转向信号，汽车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由于面临着激烈的海外产业竞争以及重复建设、落后产能的挤占效应，其投资的边际增加未能带来相应的产出增加，妨碍了产业发展。这表明在有些产业中增加资本投资已经不能促进发展。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我国产业发展规划应有四个政策方向：（1）出口“保数量降比重”。（2）由强调“硬投资”转向强调“软投资”的投资转向。（3）由依靠传统产业解决就业压力转向重视第三产业等多领域解决就业压力的就业转向。（4）构建和梳理促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培养与积累的长期机制，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是真正的强国之道。

8.城市圈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分析——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

圈为例

余静文（北京大学）、王春超（暨南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

城市圈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按照现有区域经济学理论，在城市圈发展的初级阶段，集聚效应会占主导，大量的资源由城市圈地区向中心城市聚集以支持中心城市的发展，而一旦中心城市发展成熟，城市圈的辐射效应就会出现，功能相互依存的城市体系便会形成，由于交通体系的完善，中心城市周边的地区边缘性逐渐消失，城市圈的区域体系将会演变为具有经济效率的综合体。此外，城市圈的形成可以改变地方政府之间的治理结构，改善政府运作的效率。

由于中国城市圈还处于从初级向成熟过渡的阶段，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将共同发挥作用，需要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这些效应的加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在现有的文献中，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还相对比较缺乏，其中的一个难点在于变量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再加上模型设定中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这就容易导致参数估计的不一致。然而，城市圈的形成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一个地区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是决定一个地区是否属于城市圈的关键因素，因为城市圈形成的目的便是要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通过产业对接，优势互补来谋得更加快速的发展，这种产业对接和优势互补需要各个地区的物质和要素的流动来实现，而这种流动是具有一定的运输和管理成本的，距离越远的地区，这种成本也就会越大。因此，出于对经济利益考虑，距离中心城市的远近是决定城市圈范围的关键变量，这一特点使得我们可以利用断点回归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将城市圈临界线附近的样本进行比较，以考察城市圈形成与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效地回避内生性问题。

本文利用国研网提供的2003-2007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所属省份的县市数据，使用断点回归对城市圈形成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以及城市圈驱动区域经济的机制和路径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当前阶段，辐射效应对城市圈整体经济绩效的积极影响要大于集聚效应对城市圈整体经济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城市圈的形成能够极大地促进城市圈区域经济的发展。随后，本文对城市圈驱动城市圈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城市圈的形成主要通过“蒂伯特选择”机制，即促进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两个路径提高了城市圈范围内地区的整体经济绩效。因此，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城市圈内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优化投资环境的同时提高城市圈内各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地提高城市圈区域的经济发展。最后，研究还发现城市圈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并没有发挥增长极的作用带动京津冀城市圈区域的经济增长，相反，北京利用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优势汲取周边地区的资源要素阻碍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有鉴于此，国家需要控制资源要素进一步向北京的集中，消除政策性倾向，在保

证北京正常发展的前提下,积极发挥其固有的增长极的作用,将经济发展的收益辐射到城市圈的其它区域。

9.资本约束下的银行资本调整与风险行为

许友传(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

传统观点认为,监管资本约束能引导商业银行调整其杠杆和资产组合结构,譬如,降低风险资产的持有规模与形成速度,增加对安全资产的购买与持有等,能通过调低风险加权资产的方式来提高其资本充足比率。这一观点特别强调监管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风险行为(或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风险加权资产”)的影响,而忽视了它对商业银行资本及其结构调整(或资本充足率的分子“资本”)的影响。事实上,伴随着商业银行附属资本构成的丰富和相关市场的发展,处于监管资本约束状态的商业银行已越来越多地通过筹集附属资本工具和调整资本结构的方式来管理其资本充足比率。那么,我国商业银行在其实际资本水平低于或逼近法定最低资本要求时,为规避来自监管当局的或有监管制裁和规制行动,它们又是怎样管理其资本充足比率的呢?它们是否在调整资产组合构成及其风险结构的同时,也尝试管理其附属资本工具和调整其资本结构呢?

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以我国57家商业银行(包括4家国有商业银行,10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43家城市商业银行)2000-2008年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实证研究了监管当局的资本监管压力对其风险行为和资本调整策略的影响,发现监管压力并不能显著改变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行为,但却对其资本调整策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商业银行已经违背监管资本要求时,监管压力对其资本调整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当商业银行尚未违背但正逼近监管资本要求时,它们有较之其他未违背监管资本要求的商业银行更快的资本调整速度,并有倾向调增其资本充足比率。对商业银行资本结构调整策略的进一步研究还表明,监管压力仅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化有显著影响,对其核心资本率的变化并无显著影响,鉴于总资本是由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构成的,故可推断“当商业银行的资本水平逼近监管资本要求时,它们有倾向通过调增附属资本的方式来提高其资本充足比率”。

研究带来如下两点启示:第一,在监管资本约束下,商业银行不一定非要调整资产组合构成、缩减风险资产规模等来管理其资本充足比率,它还可以通过管理资本工具及其构成的方式来满足当局的监管资本要求。特别地,伴随着银行附属资本构成的丰富和相关资本工具市场的发展,处于监管资本压力状态的商业银行完全可通过发行资本工具、管理附属资本的方式来提高其资本充足比率。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资本监管不一定能起到降低银行风险行为的目的。若要使资本监管能更好地发挥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激励的降低作用,监管当局应对监管资本的构成以及特定资本工具计入附属资本的比例进行针对性的限制,以降低商业银行可能的资本套利动机和套利空间。第二,鉴于统一的监管制裁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银行有

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譬如对地方性的城市商业银行而言,限制其机构、业务和市场的准入压力要显著小于全国性银行,进而有可能导致其对此类资本监管制裁行动的低弹性反应,因此监管当局应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银行实施分类的资本监管,并应尽早研究分类监管制裁行动和手段的可行性与适当性。

10.我国中期通货膨胀压力预测——基于银行间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经验研究

李宏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

利率期限结构又称收益率曲线,是指仅到期期限不同债券的收益率与其到期期限所描绘的曲线,更严格地是指只有到期期限不同的无违约风险的零息票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讨论通常都是指国债收益率曲线,其斜率可以通过考察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的差来测定,也即长短期利差,它包括了大量实体经济运行和通货膨胀的信息。根据费雪效应,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和,收益率曲线的斜率反应了市场参与者对未来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的看法。以 Mishkin 为代表的大量国外研究表明,利率期限结构包,特别是中长期收益率曲线,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的信息。当收益率曲线斜率陡峭时,表明市场参与者预期未来存在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反之,当收益率曲线斜率变得更为平缓时,表明市场参与者预期通货膨胀压力减小,未来通货膨胀率将下降。

在政策实践方面,大多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当局非常关注收益率曲线的变动情况,并将之作为货币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随着经济金融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也将由以准备金等数量型工具为主的直接调控模式,过渡到以利率价格型工具为主的间接调控模式。因此,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走势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由于债券市场起步较晚,对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关系方面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而且仅限于一年内的短期分析。本文利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提供的银行间国债即期收益率数据,对我国3~5年的中期利率期限结构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进行了经验研究,发现我国中期利率期限结构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变动的信息,因而可以作为判断未来通货膨胀走势的指示器。与 Mishkin 等很多国外研究不同的是,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测能力在3年和4年期效果最好,而且较长期限的实际利率也并非稳定,名义利率期限结构变化包含了实际利率期限结构变化的信息,这很可能与我国经济仍然处于起飞阶段以及当前特定的货币政策框架和并非十分成熟的金融市场结构有关。

本文通过对我国实际情况的考察,发现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变动的关系比较符合我国最近一轮通货膨胀周期的实际经历。2004年和2005年,我国利率期限结构斜率较2002年和2003年出现明显的上升,与之相对应在2004年之后的3~4年(也即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正是上一轮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最大的时期。尽管持续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及2008年9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物价也开始回

落,但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下,2009年下半年以来,市场对未来中长期通货膨胀仍然存在较强预期,收益率曲线斜率并未出现明显下降,表明未来3~4年内,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是比较大的。因此,有关方面应该对未来通货膨胀压力予以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措施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有效防范和化解通货膨胀风险。

11. 信贷偏好与中国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增长结构——基于中美两国数据的比较分析

汤向俊(江苏科技大学) 任保平(西北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

消费信贷市场完美程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结构产生显著影响,是我国形成高投资、低消费经济增长结构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理论模型分析,以抵押贷款为主的信贷制度对家庭消费和厂商投资行为产生不同影响,信贷市场将形成以投资型信贷为主、消费信贷非常有限的状况,进而形成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结构。同时,本文选取了以高投资为主的中国和高消费为代表的美国作为代表性国家,分析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结构产生的不同影响。

通过中美两国的实证数据比较分析,中美两国消费信贷有效放松了居民的预算约束,扩大了内需,进而验证了消费信贷有助于形成高消费、低投资经济增长结构假说。本文认为在消费信贷结构中,中国以房地产抵押贷款为主,2008年高达69.4%,房地产贷款一方面可以放松居民户的信贷约束,另一方面却带来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猛增;在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中存在一个称之为房地产净值贷款的项目,因该项贷款用途灵活,可以用于购买家庭消费品,有效地放松了家庭的信贷约束,这是美国居民家庭储蓄率在过去多年中为零甚至为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指出应努力改变我国房地产抵押贷款为主的消费信贷结构,积极探索发展房地产净值贷款,放松居民预算约束,促进个人消费。

本文认为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并不是消费占GDP比率下降的原因,在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中,也并不支持把基尼系数作为各国消费占GDP比率变化原因的解释。这一论点同国内的现有研究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以中美两国财政支出结构为例,对上述分析进行了解释,认为美国社会福利类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稳定在30%左右,其中2006年该比率上升至42.44%,为居民消费提供了可预期的宏观环境。中国2008年社会福利类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为10.87%,该比例相较于发达国家仍然很低,难以为全社会提供均等的公共福利。因此,国家应继续提高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居民消费提供稳定的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扩大内需。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缓解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问题。通过扩大社会福利的公共支出,为居民提供稳定的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即期消费,扩大内需。通过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信用贷款的交易成本,创新消费信贷产品和服务方

式,建立以居民消费信贷需求为导向的信贷产品。同时放宽金融业的准入限制,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增加消费信贷的供给,降低居民的信贷成本,促进居民消费,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解决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失衡问题。

12.中国流通业税收贡献的实证分析

王乔 席卫群 汪柱旺 张仲芳(江西财经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

流通业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承上启下的行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本文运用税收增长率、宏观税负、边际税负、税收增额贡献率、资产税收贡献率、税收协调系数等税收贡献指标,对我国流通业的税收贡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流通业中,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税收贡献过度,无论其税收负担,还是边际税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2008年,税收协调系数均高于1.0,而且自2005年起该系数超过2.0,表明相对于行业生产总值的增长,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税收贡献过度,总体处于高税负状态。与之相反,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和仓储业的税收贡献不足。尽管2000-2008年,其税收负担呈加速增长趋势,但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年税收负担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9%,2008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5%。边际税负方面,除2003年和2008年边际税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年份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2年、2006年和2007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4%左右;税收协调系数尽管近年有所上升,但均低于1.0,表明相对于行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其税收贡献不足,总体处于低税负状态。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流通业的税收贡献也存在差异。本文采用聚类分析方法,运用2007年和2008年全国31个省份流通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业和交通运输、仓储业税收贡献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综合评价结果进行排序,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流通业的税收贡献不可小视,如云南、重庆、西藏、内蒙古、贵州、新疆等居于前列。除北京、上海、广东外,东部地区不少省份如山东、福建、天津、河北等税收贡献排名居后。无论是批发、零售和餐饮业,还是交通运输业都具有此特点。这说明,未来应重视中西部地区消费能力的发展,在拉动内需方面,中西部地区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文建议: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减少批发、零售贸易的增值税负担,允许批发、零售贸易企业自主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即已达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的,也可以选择按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从而降低税收负担;将物流业的营业税率统一调整为3%,解决物流行业内部税率不统一的问题;运用企业所得税政策,增强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力度,鼓励流通行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的发展;配合国务院出台的区域振兴规划,提高对中西部地区流通业发展的税收扶持力度。通过这些措施鼓励流通业的发展,提高消费信心,促进内需。

13.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中合谋防御的机制设计

蒋神州 (南开大学), 《经济评论》2011 年第 1 期

合谋行为严重地减低了公司的经营绩效,致使国有资产变相流失,也侵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解决合谋问题需在信息不对称与交易费用之间寻求平衡点,制定出合理的合谋防御机制。在一个合理的合谋防御机制中,委托人能操纵监督者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满足监督者和代理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情况下,使得合谋各方没有激励去进行合谋。

对组织的合谋理论文献梳理表明构建一个合谋防御机制是可行的。但以合谋防御的机制设计为研究主题的文献在国内还是不多,尽管合谋的机制设计是否存在均衡已有大量文献作了研究,可对于均衡产生的最终结果少有研究,很难指导公司治理的实践。本文首次将 Laffont 的激励理论引入到公司治理的研究中,并结合有关合谋的文献研究,使用机制设计的模型,为中国公司治理提供一些理论上的最优解,丰富了公司治理的研究方法。并在重新对企业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本文依据委托人应该是剩余的索取者也应该是风险承担者的理论,结合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会多为国有股代表而不用承担剩余风险的实际情况,对国有控股公司中的委托人、监督者和代理人进行重新界定。本文认为,政府是实际委托人;董事会只是监督者;总经理是代理人。

本文对有无合谋防御机制的情形均作了博弈分析。对合谋防御机制缺失的研究表明:在委托人完全缺位的情况下,企业处于低效率运行状态,甚至亏损;在委托人行使部分职能的情况下,企业利润是政府的最低预期收益或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收益要求中的较低者。根据上述两种合谋问题本文分别设计了合谋防御机制:一个是由监督者主导的防御合谋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委托人事先给出一组契约,授权监督者与代理人签订子合约。委托人给出的契约可使得监督者和代理人所得到的转移支付都不小于其实施合谋时的信息租金,这时监督者将没有激励去与代理人签订合谋子合同,企业能获取其应得盈利;另一个是委托人主导型的合谋防御机制。在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条件下,委托人同时与监督者和代理人签订契约,对企业产出进行观察,并支付相应的转移支付。如果代理人是低成本产出的,则监督者只获取其额定收益。如果代理人报告是高成本类型,委托人将要求监督者进行全面调查。如果监督者调查结果显示代理人成本类型原本应该是低的,那么委托人将会对代理人实施惩罚,这种惩罚可以是显性惩罚,也可以是声誉上的隐性惩罚,而监督者会因此获得一定的额外报酬。如果情况属实,则双方只领取自己的契约薪酬。本文的两种机制都推导出了具体的博弈均衡点。

理论前沿动态

14. 破解我国贸易顺差成因问题的关键环节

王剑锋（对外经贸大学）

《中国贸易顺差研究的脉络梳理与未来展望》，《经济评论》2011 年第 1 期

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急剧下滑，研究贸易顺差问题的紧迫性似乎有所下降。但需要注意的是，已有成果还未能将我国贸易顺差现象的体制因素分析清楚。由此带来的影响是，旨在拉动内需的政策不仅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还会加大未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而要想在这一领域取得新的突破，首先应该做好已有成果的梳理工作并厘清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按照“内生”抑或“外生”的标准，可以将已有观点划分为外因论与内因论两个类别。外因论主要强调了汇率作为政府可控的“外生因素”在增加出口中的作用。然而，截止到金融危机发生前的 3 年中，伴随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大幅上升，净出口在 GDP 中所占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明显上升。仅从汇率角度并不能解释我国净出口比重过高现象的形成原因。内因论则认为过度依赖外需现象内生于我国的资源禀赋状况。主要包括两个类别：一是国际产业转移论。这类观点主要强调我国在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降低了出口企业成本并导致贸易顺差扩大。二是储蓄投资差额论。从当前情况看，这一领域在经历了金融体系差异论、预防储蓄论、文化影响论、年龄结构影响论以及信贷歧视条件下企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影响论之后，已逐步在国民收入分配偏向导致贸易顺差扩大的观点方面达成共识。

在国民收入分配偏向现象的研究中，学界除了关注再分配环节中的问题以外，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导致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观点逐步得到了认可。进一步的研究又将劳动报酬占比下滑归因于产业结构中资本要素密集度的提高。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的上升主要是受到了 FDI 的影响。然而，FDI 无疑会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密集度，但在我国其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为何会如此之大呢？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储蓄投资失衡的分析思路，本文尝试提出两个研究重点：（1）地方政府扭曲产业结构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随着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到来，学术界在“中国式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的增长激励及其经济贡献方面，已经逐渐达成了共识。然而，到目前为止，还少有文献将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与高增长中“居民收入比重过低”的问题联系起来。为了实现本地经济的快速增长，地方政府往往会把产品输出能力强、税收贡献大的工业企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首选。向企业的过度政策倾斜，在增加其收入比重的同时，导致劳动报酬份额的相对下降。（2）融资体系与货币政策变迁对储蓄转化率的影响。有分析认为，在信贷市场

存在所有制歧视的条件下,非国有工业企业比重的上升,导致中国同时出现企业储蓄率上升以及国内投资对储蓄吸收能力下降的直接原因。但其除了尚未回答中国非国有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比重为何高于其他国家以外,还忽略了国企比重下降主要发生在 1995-2002 年而不是 2004-2007 年这一产值角度的事实。要对这些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还需要结合中央与地方围绕宏观调控存在博弈行为这一背景,对融资体系与央行货币政策手段的变迁过程及其对储蓄转化率的影响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15. 货币政策是否应该直接干预房地产泡沫?——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段忠东(厦门大学、厦门理工学院)、朱孟楠(厦门大学)

《不确定性下的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反映——一个文献综述》,《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

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货币政策如何应对房价等资产价格波动”就已经成为货币政策理论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这一趋势在美国次贷危机后表现尤为明显。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学者还未就此达成广泛的一致。

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的争论集中表现为间接反应观、事后反应观与直接干预观。持间接反应观的学者认为,中央银行不应该直接关注房价等资产价格,而是应该在房价包含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信息时作出政策反应。其理由是,事前的直接干预政策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实践性难题,导致该政策不具有可操作性或者政策风险过高。这些难题主要有:如何识别房地产泡沫,如何保证政策工具控制泡沫的有效性,如何有效降低泡沫破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上述难题存在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加大直接干预政策的政策风险。持事后反应观的学者认为:中央银行应该立足于正确处理房价下跌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反对事前直接干预的理由与前者基本一致,并且更进一步指出,由于从房价变动到消费、投资的传导具有长期滞后性,并且存在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负面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消除或降低。持直接干预观的学者可以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激进派认为货币政策应当直接干预房地产等资产泡沫,而温和派则认为货币政策除了应该对房价波动进行间接反应外,还应该在一定条件下直接干预房价泡沫。直接干预观的依据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将严重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且央行能够识别房地产泡沫。其中,激进派学者的理由是房地产泡沫导致资源配置紊乱和泡沫破灭将产生严重影响;温和派学者则认为,不同条件下应该采用不同的反应规则,间接反应和直接干预之间存在互补和融合关系。针对困扰直接干预观的实践性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持乐观态度,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金融监管在防止资产泡沫及其破坏性影响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同。他们认为:第一,谨慎监管旨在确保金融机构诚信经营并适当管理风险;第二,运用资本金要求等

监管工具可以有效控制资产价格繁荣时期形成的金融机构资产组合扭曲,进而避免银行信贷资产对泡沫的过度暴露;第三,与政策利率工具相比,宏观审慎工具导致宏观经济负面影响的风险更低。

最后,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政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是影响政策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货币政策应该综合运用直接干预与间接反应方式应对房价泡沫;(2)货币政策与金融审慎监管的协调配合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目标。总之,该研究主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所涉及的一系列基础性命题大都是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需要大量艰苦细致的努力。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该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尤其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该主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学者的理论基础研究还十分薄弱,学者们大多借鉴国外学者的实证方法,缺乏结合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特定制度性因素的现实考察。此外,将研究视角拓展为开放经济条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6. 中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研究 —— 一个文献综述

赵学刚 王学斌 刘康兵(上海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统计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统计部门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总体来看,中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问题一直存在,统计体系还是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现实。国际上对统计数据质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绝大部分文献仍然以准确性作为核心内容,因此统计数据质量存在问题一般都是指统计数据失准或失真。对中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研究的简要回顾希望能够引起全社会对我国统计体系的关注及其改革方向和对策的讨论。

理论层面上,关于统计数据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统计数据失真机理、质量控制、质量评估和质量管理等。关于统计数据失真机理,文献主要从统计部门、统计体系和统计外部体制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统计数据质量的控制,主要是数据搜集和整理过程中对误差的控制;统计数据质量的评估一方面可以检验所搜集到的数据本身的质量,另一方面还可以检验数据搜集过程中质量是否得到有效控制;在对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有效控制和评估的同时,建立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是实现统计数据质量持续改进和统计工作全过程质量提高的有效途径,国外关于数据质量管理体系的研究,很多基于全面质量管理(TQM)的原则、方法、指南,也继承了ISO 9000系列标准的框架。

实证层面上,关于中国统计数据质量的研究,绝大多数直指国际上争议颇大的GDP及其增长率的准确性问题。国外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质量问题的正式研究成果,大多数认为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一定程度上偏高。这些研究从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的角度提出了对中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的质疑。近年来,关于我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的讨论在国内也相当热烈,国内学者主要从微观角度进行了评估和检验。不同文献所使用的方法的不同可能会导致评估结果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量的实证研究从多个角度证明了中国政府

统计数据质量问题的确存在。

政策层面上，针对统计数据质量问题，中国政府统计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如改革统计调查方法、统计汇总方法、工业不变价增加值计算方法，扩充统计调查范围等，逐步细化统计的产业部门分类（特别是规模以下工业）和支出项目分类，建立经常性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建立各专业分季度统计调查制度，完善价格统计，弥补未被观测的统计缺口，建立相对独立的统计管理体制来完善 GDP 核算。

当前公众对经济增长、住房、物价、居民收入、就业等与人民福利息息相关的统计数字“怨声四起”，“被增长”、“被就业”则是广大公民心声的真实写照，这都反映出纸上数字与实际感受之间的巨大反差。统计部门应该认真听取社会公众和专家意见，进一步改进统计工作，增强统计数据真实性、客观性和实用性，还中国经济以本来“面目”。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自 1980 年创刊以来，本刊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本刊设有中国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经济理论探索、理论前沿动态、新书评介等栏目，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CSSCI 来源期刊。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和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态势，《经济评论》适时调整和更新研究主题，强调现代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大力扶持青年才俊；另一方面，全面落实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进一步加大了与国际学术刊物规范接轨的力度，不断提升《经济评论》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 27 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 28 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全国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排名第 4；根据最新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在全国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期刊的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位居第 5。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 (<http://jer.whu.edu.cn>) 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er@163.com
